

《文心雕龙·颂赞》篇新论三题

杨化坤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摘要]《文心雕龙·颂赞》篇是系统论述颂体与赞体的专论,因年代久远,词旨晦涩,后世有不少的地方存在着误读,亟需厘正。“雅而似赋”中的“雅”为讽谏之意,并非雅正的意思;“不辨旨趣”中的“旨趣”,指《赵充国颂》和《显宗颂》的精神主旨,而非颂与风雅的关系;“敬慎如铭”是指颂与铭一样恭敬慎重,而非《文赋》中的“优游”之意,更不可将“铭”换为“箴”。

[关键词] 颂; 讽谏; 旨趣; 敬慎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8)01-0095-05

《文心雕龙》产生于南朝齐梁时期,是中国文论史上一部“体大思精”的经典著作。但一方面因年代久远,导致不少异文产生,同时又用骈文写成,词旨晦涩,因而存在不少令人费解之处。笔者在研读其《颂赞》篇的过程中,即发现当今学者对“雅而似赋”、“不辨旨趣”、“敬慎如铭”三处的解释不尽相同,众说纷纭。而这看似微小的三则词语释读,实则关系到刘勰对颂与赋、雅、铭文体之间异同的认识,颇值得进一步辨明。笔者不揣鄙陋,拟在前人基础上,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雅而似赋

《广成颂》和《上林颂》是东汉经学大师马融(79-166)的两篇作品,前者见《后汉书·马融传》,后者今亡。二文虽名之曰颂,实则赋体。如《广成颂》铺采摛文,篇末寓讽,故刘勰说:“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1]327}对这种模糊文体功能的写作方式提出批评。《文心雕龙》诸多版本中,此处本无异文,但由于《上林》久佚,加以个人理解的差异,致使后人对其文字产生种种疑问,首先需要理清和说明。

挚虞《文章流别论》是产生于《文心雕龙》之前的一部重要文论著作,也是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重点参考的对象。对于《广成》《上林》二颂,其云:“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2]2647}很显然,刘勰上述的评论正从此申发而来,郭晋稀认为,“雅而似赋”中的雅“当是颂字之讹,正指《广成》《上林》,用《文章流别论》为

说”^[3]。笔者认为,“雅而似赋”虽可通,但问题在于:一是没有版本依据,二是“雅而似赋”自可解释,不必强加校改。其次,对于“弄文”,刘永济校曰:“疑‘美文’之伪。”^[4]亦属臆断。杨明照云:“按本书屡用‘弄’字:《杂文》篇赞‘负文余力,飞靡弄巧’,《谐隐》篇‘纤巧以弄思’,《养气》篇‘常弄闲于才锋,其用弄字,义与此同。《议对》篇‘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正以弄文为言。”^{[5]116}足以证明“弄文”不误。

“雅而似赋”文词明白浅易,但蕴藉丰富,后世解释也颇有出入。该句中,首先需注意的是“雅”字。“雅”本为鸟名,后引申为雅正之意。《毛诗序》解释说:“雅者,正也。”又云:“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则“雅”又为讽谏之意。那么此处的“雅”字究竟作何解释呢?笔者翻阅诸多著作,发现以往学者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种,一作典雅、雅正解,一作讽谏解。作典雅、雅正解如:

赵仲邑:“语句典雅,可是像赋。”^[6]

向长清:“文雅而似赋。”^[7]

林杉:“虽然典雅,却写得象是赋。”^[8]

张灯:“文字雅丽,酷似辞赋。”^[9]

张长青:“词句典雅,但是像赋。”^[10]

这种观点还可细分为二种,一为文辞典雅,如赵仲邑、张灯、张长青。一为文意雅正,如向长清、林杉^①。二者区别不大,故而视为一类。

作讽谏解如:

陆侃如、牟世金:“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

[收稿日期] 2017-09-30

[作者简介] 杨化坤(1985-),男,安徽怀远人,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赋。”^{[11]174}并注:雅是风雅颂的雅,这里指有雅的用意、内容。

周振甫:“雅:正,指讽谏。”^{[12]86}

吴林伯:“有诗雅之意,而辞却似赋。”^[13]

褚世昌:“‘雅’指的是《广成颂》写作的动机是规讽统治者轻视武备。”^[14]

“雅”作为《诗经》中的一种,无论是大雅还是小雅,均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用以抒情言志的作品,具有讽谏的作用,故而上述学者将这里的“雅”理解为讽谏。上述两种解释孰对孰错,笔者认为,不仅要分析其词义,还需联系前后文及《广成》《上林》颂的写作背景,方能判断。考察“雅而似赋”的内在逻辑,可理解为“雅,而似赋”,也可作“雅,但似赋”。前者表修饰关系,后者为转折关系。不管这里的雅指文辞典雅还是文意典雅,均与后文“何弄文而失质乎”的批评矛盾。刘勰对颂这种文体界定说:“敷写似赋,而不入华奢之区。”^{[5]117}认为颂虽可铺排,但不能奢华无节制。而上文的“弄文”也即等同于这里的“入华奢之区”,意在指责《广成》《上林》卖弄文辞。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是典雅呢?显然这种观点无法成立。

如果将“雅”理解为讽谏,则“而”字必为修饰关系,方符合原意。《诠赋》篇云:“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无贵风轨,莫益劝戒。”^{[5]97}刘勰对一味注重文辞而忽视讽谏功用的赋作提出批评,正与此相同。这么看来,把“雅而似赋”中的“雅”理解为讽谏,与文意也不矛盾。

由此可见,这里的“雅”当为讽谏之意。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还可以从《广成》《上林》颂的创作背景来进一步论证。《后汉书·马融传》载:

邓太后临朝,鸷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搜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纵横,乘此先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15]。

当时俗儒普遍认为应该大兴文德,废弃武功,因此朝廷“寝蒐狩之礼,息战陈之法”,但这样也导致了一系列治安问题,奸猾纵横,民生不安。对于这种情况,马融颇为愤慨,上颂以讽,指谏国政,主张恢复蒐狩之礼。《上林颂》原文虽已佚,但《艺文类聚》引《典论》曰:“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16]1730-1731}当时灾害连连,民不聊生,而桓帝却游猎上林,马融对此不满,上《上林颂》讽谏。两次上颂目的,均在指责当权者的过失,与《毛诗序》“至于

王道衰,礼仪废……而变风变雅作矣”的精神一致。所以把“雅”字理解为讽谏,无论从文意看,还是从写作背景和意图考察,都是合情合理的。

刘勰在《颂赞》篇中强调:“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5]315}指出“雅”具有讽谏的功用,恰好与此处的“雅而似赋”遥相呼应。同时,“雅而似赋”的后面一句是“何弄文而失质乎”。“质”当为颂的本质,也即决定其是颂体而非赋体的最根本条件,显然这里的“质”即指颂体有颂无讽的特点。那么“雅而似赋”中的“雅”字,只有解释为讽谏,才会与“失质”相互照应,若为雅正,上下文的意思便会扞格不通。

二 不辨旨趣

刘勰在《颂赞》篇中批评挚虞说:“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辨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5]331}后世研究《文心雕龙》之人众多,但“不辨旨趣”的含义一直未见合理解释,而这事关刘勰对颂体的态度,也即颂之体式的基本要求,故需详加辨明。为便于论述,我们首先列出《文章流别论》的相关原文:

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2]2647}。

在解释文意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厘清一个版本问题。“不辨旨趣”,唐写本作“辨”,黄叔琳注本作“变”。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等人径以“变”字解释,均认为挚虞所持观点为颂中糅入风雅而旨趣不会改变,刘勰因此对其批评。细读挚虞原文,这种观点实属误读。在挚虞看来,《赵充国颂》和《显宗颂》本为颂作,却糅入了风雅的内容,无论是措辞还是行文语气,都流露出一不满的态度。此处若为“变”字,不仅忽略了“不辨旨趣”的异文现象,同时也违背了挚虞的原意。

其实,这个问题前人早已有所关注,范文澜注:“孙云唐写本‘变’作‘辨’。”^[17]詹锳引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若作‘变’,则系转为扬、傅二家之颂有所辩护,无论于语气辞义,俱嫌脱节,故以改从唐写本为胜。”并云:“唐写本‘变’作‘辨’,按作‘辨’字是。”^{[1]333}杨明照亦云:“按‘辨’字义长。盖谓挚虞‘杂以风雅’之评语过于笼统也。”^{[5]116}此处当作“辨”字无疑。至于“不辨旨趣”的含义,詹锳引《文心雕龙斟诠》:“彦和此节论挚虞《文章流别论》之品藻,虽颇为精核,但……以其语过于空洞,并未说明

颂与风雅之旨趣究竟有何不同,使读者难以了解其指归所在,故于‘至云杂以风雅’句后,即紧接此断案曰‘而不辨旨趣’,则其所谓不辨云者,自指挚虞之评语但言其然而未申述其所以然而言。”^{[1]332-333}

即认为刘勰批评挚虞是因为其没有区别清楚颂与风雅旨趣的不同。这种解释从字面似乎说得过去,但要联系上下文,则明显存在逻辑不通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原文和相关文献的研读,发现另一种解读方法要更为合理。

根据上文所引《文章流别论》的文字可以看出,挚虞对扬雄《赵充国颂》和傅毅《显宗颂》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它们并非纯正颂体的写法,而是掺杂了风和雅的内容。《显宗颂》今已不存,但《赵充国颂》尚在,收录于《昭明文选》卷四十七。根据李善注,文中多处化用《诗·雅》,如“汉命虎臣”,《大雅·常武》:“进厥虎臣,阍如虓虎。”“整我六师,是讨是震”,《大雅·常武》:“整我六师。”《大雅·常武》:“徐方震惊。”甚至文中还直接说:“诗人歌功,乃列于雅。”所以这种糅雅入颂的写法是极为明显的,挚虞因此表示不满。但刘勰对《赵充国颂》和《显宗颂》的态度却恰好相反,他说:“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认为《赵充国颂》和《显宗颂》虽然“浅深不同,详略各异”,但在“褒德显容”方面,与《诗经》中的颂篇并没有什么区别,仍是正确的作颂之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刘勰对二颂看法与挚虞的不同,也就是他对挚虞进行批评的原因所在。

同时还需注意到,刘勰批评挚虞时用到了“黄白伪说”的比喻。《吕氏春秋·别类》篇:“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不韧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韧也,又柔则卷,坚则折,剑折且卷,焉得为利剑!’”^[18]前人讨论“不辨旨趣”时,很少联系到这个比喻,但其对于理解文意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白锡和黄铜各有短长,辩难者得出“剑折且卷”的结论,是基于白锡易折,黄铜不够坚硬,把两种金属熔铸在一起,那么各自的缺陷就会掩盖对方的优点,所得之剑只会既容易折断,又不够坚硬。而刘勰认为,颂主告神,风雅用于人事,把本不属于告神之用的风雅糅入颂作,自然会破坏颂之体式。我们看到,二者恰好具有一致性,即均以掺入缺陷来消除自身优点,因此刘勰将它们加以类比。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文中的“杂以风雅,而不辨旨趣”是指挚虞只注意到《赵充国颂》、《显宗颂》中

的风雅之意,但是没有对二颂的旨趣进行辨析,即认为二颂虽含有风雅的内容,但“褒德显容”的功用并未发生改变。所以这里的“旨趣”,其实指《赵充国颂》和《显宗颂》的精神主旨,显然不是颂与风雅之间的关系。

三 敬慎如铭

刘勰在总结颂的文体特征时说,颂“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5]334}。关于这句话中的“敬慎”一词,大多学者都理解为恭敬慎重或庄重严肃之意,如陆侃如、牟世金译作:“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11]175}周振甫解释为:“庄重谨慎象铭文,但不同于规劝警戒的含意。”^{[12]86-87}此外仍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其一是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解释“颂惟典雅”至“汪洋以树义”时所云:

陆士衡《文赋》云:颂优游以彬蔚。李善注云。颂以褒述功美,以辞为上,故优游彬蔚。案彦和此文敷衍似赋二句,即彬蔚之说;敬慎如铭二句,即优游之说^[19]。

黄先生认为刘勰的观点源于《文赋》,故径直将二者等同起来。此外,与上述两种对刘勰观点进行阐发的解释不同,刘师培则对刘勰的说法径直提出异议,他认为:

三代之铭,分为二体:一主儆戒,略近于箴;一主颂美,与颂为伍。皆铭刻于器。前者如汤之《盘铭》及《大戴礼·武王践祚》篇之铭十七章;后者如孔伋《鼎铭》是也。彦和此所谓铭,专指近于箴之一体而言,故谓颂应“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不知铭中尚有颂美之一体。此句若易“铭”为“箴”,则义无不安;以箴铭之作俱宜简敛,而箴则惟有规戒之义,无颂美之义也^[20]。

在刘师培看来,刘勰上述论断中,如果将铭换为箴似乎更加合适,因为铭兼有规诫和颂美之意,而箴只有规诫的意思。

上述三种观点各不相同,究竟哪一种更加合理。笔者反复研读《颂赞》篇原文,并综合考虑颂、铭的文体特征,认为黄侃的观点过于牵强。刘师培的观点有误,刘勰称颂与铭一样严肃谨慎,正是看到了这两种文体的共同点,并无不妥之处。陆侃如、牟世金与周振甫的观点虽符合刘勰原意,但对于“敬慎”的深层含义并无阐发,所以还需进一步分析。

《文赋》云:“颂优游以彬蔚。”李善未作解释,吕向补充说:“颂以歌颂功德,故须优游纵逸而华盛也。彬蔚,华盛貌。”^[21]又张少康《文赋集释》引徐

复观语:“《诗·大雅·卷阿》:‘优游尔休矣。’朱熹《集传》:‘闲暇之意。’”并补充说:“此处,乃从容自然,歌功颂德而不着痕迹。”由此可知,优游乃从容和缓之义^[22]。所以优游应当是从容和缓之意。“敬慎”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共有三处,分别是《大雅·民劳》:“敬慎威仪,以近有德。”以及《大雅·抑》及《鲁颂·泮水》中的句子:“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又张衡《东京赋》曰:“敬慎威仪,示民不偷”,李善注:“敬,宜也。”^[23]“敬慎威仪”指仪容庄重而严肃。刘勰用来指称颂与铭的风格特点,即认为它们严肃而慎重,不流于浮华。这么看来,敬慎与优游的词义并不相同,二者强调的是颂体风格的不同方面,不能完全划等号。

刘师培说:“彦和此所谓箴,专指近于箴之一体而言”,“若易铭为箴,则义无不安”。原因是“箴则惟有规戒之义,无颂美之义也”。言下之意即认为“敬慎”乃箴及“近于箴之一体”的铭所拥有,而表颂美之义的铭则没有这个特点,所以才会认为若将刘勰原文变为“敬慎如箴,而异乎规诫之域”更为合适。这种观点存在一个假想的前提条件,即首先判定刘勰“不知铭中尚有颂美之一体”,但事实并非如此。《铭箴》篇中,刘勰两次对铭的颂美作用强调,他首先引用臧武仲论铭之语:“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并举出具体作品加以补充:“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诤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惺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5]139}后又在下文称“铭兼褒赞”^{[5]140},可见,刘勰对铭之颂美功用认识得很清楚。既然如此,自然不能认为“敬慎如铭”是因为刘勰不知铭的颂美功用而有此说。

刘勰认为,颂、铭的相同之处是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恭敬谨慎态度,同时又排除了以规劝为宗旨的铭。因为从文体特性上看,箴和“近于箴之一体”的铭与颂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前者主规诫,后者为颂扬。而记功颂德之铭与颂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甚至很多情况下二者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正因如此,刘勰才会认为颂与这类的铭较为相似,都为恭敬严肃之作。同时为了表达确切,又加以补充,将用于规诫之铭排除在外。因此我们看到,倘若依照刘师培的观点将铭换为箴,反倒违背了刘勰的初衷。

刘勰在将颂与铭作对比时,正是基于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而构成颂、铭“敬慎”特点的原因和表现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与颂、铭的用途有关。颂和铭虽是不同的文体,但均源于古代的礼仪制度,在使用场合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概括说来,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俱为告神之辞;二是均有明确的现实意义,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以下我们便从这两个方面对颂、铭的“敬慎”特点进行分析。

颂、铭用于告神、祭祀时,是指与神灵和先祖的对话,文辞须典雅凝重,不能有浮华和不恭之处,也就是需要庄重而谨慎。关于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16]1018}刘勰也认为:“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5]108}颂乃用于宗庙之正歌,与描写人事的作品不同,所以必须“敬慎”。正如赵湘在《宋颂序》中所说:“臣湘谨清净心意,盥沐舌发,稽首穹昊,拜手皎日,撰为《宋颂》,以告于神明。”^[24]撰写之前有如此多的仪式,虽然只是恭谦之词,但也显示了作者对之的确极为重视。同样,铭最初刻于鼎等器物之上,史岑《出师颂》“功铭鼎铉”李善注:“铭者,论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勋劳,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23]661}说明铭也与颂一样用于祭祀。此外,铭还可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礼记·祭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25]表明铭的作用之大及地位之高。将功德刻于鼎上,其目的是传之久远,供后人瞻仰,所以行文须严肃谨慎。

颂、铭均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政治需求,二者另一个共同点是用于纪功,一方面以德服人,便于管理天下,同时也以刻石方式进行传播,留待后人称颂。这两个方面的意义都是极为重大的,前者是为了现实需要,后者则有着显著的历史意义,都需要谨慎对待。颂、铭有着明确的使用对象和场合,倘若没有注意到这些,那便是失礼的表现,《诗经·鲁颂》便是极为典型的例子。秦汉之前,只有天子才可用颂,鲁国国君僖公身为一介诸侯,但《诗经》中却存留四篇歌颂僖公的颂作。尽管后代不少学者为之辩解,但仍遭到很多人的指责而被斥之为“变颂”,如宋代的严粲就说:“《鲁颂》,颂之变也。……雅、颂,天子之诗也,颂非所施于鲁,况颂其郊乎?”^[26]《鲁颂》不被后人认可的重要原因就是颂专用于天子,而僖公只是诸侯而已,以诸侯的身份配颂,就是不合礼法。区分如此严格,说明了颂在创作时的谨慎严肃。宋张俞《答吴职方书》记载,自己曾为人作《讲堂颂》,但对方“谓俞所作《讲堂颂》为叙己之德,于书衡立石,礼未便安,俾别为记闻之”,认为以颂体

记之不合乎礼仪^[27]。尽管张俞在信中举出前代很多的例子进行辩驳,但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了颂体尽管在后世的适用对象虽不再限于天子,但仍未能普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森严的社会等级。

与颂一样,铭文在这一方面也有着相同之处。较为典型的例子是上文所引臧武仲论铭,身份不同,铭刻的内容也不一样,说明了古人对铭文创作的认真及要求之严。成书于梁代的《文选》收录有陆倕《石阙铭》一文,程章灿师认为,“此篇得以编入《文选》,固然与陆氏曾为‘昭明十学士’之一或有关系,而最为重要的原因,乃是这篇文章对梁朝政权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从梁武帝即为起,“萧衍及其萧梁政权就面临着正统性的质疑,承受着由此造成的心理焦虑”,急需向社会宣示自己的合法性。所以萧衍对《石阙铭》极为重视,并亲自动手润饰,“对于梁武帝来说,撰写《石阙铭》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其次才是一次文学创作”^[28]。这样一篇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铭文,无论是作者陆倕还是萧衍无疑都需要十分严肃认真地对待,充分体现了铭文严肃谨慎的特点。

注释:

①向长清和林杉并未明确说明是文意还是文辞。倘为文辞,则与赵、张、张无别。这里权且认为他们的解释为文意雅正。

[参考文献]

- [1]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2] 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6.
- [3] 郭晋稀.文心雕龙[M].济南:齐鲁书社,2004:77.
- [4]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
- [5]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81.
- [7] 向长清.文心雕龙浅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111.

- [8] 林杉.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120.
- [9] 张灯.文心雕龙新注新译[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76.
- [10] 张长青.文心雕龙新释[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132.
- [11]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 [12]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3] 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24.
- [14] 褚世昌.文心雕龙句解[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82.
- [15] 范晔.后汉书[M].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1954.
- [16]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58.
- [18]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662.
- [19]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3-74.
- [20]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225.
- [21] 萧统.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55.
- [22] 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7.
- [23]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4] 赵湘.南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6:7.
- [25] 孔颖达,等.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06-1607.
- [26] 严粲.诗緝[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476.
- [27] 程遇孙.成都文类[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20-523.
- [28] 程章灿.象阙与萧梁政权始建期的正统焦虑——读陆倕《石阙铭》[J].文史,2013(2):111-126.

Three New Discussions about “Songzan” in Wenxindiaolong

YANG Hua-ku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e chapter of “Songzan” in *Wenxindiaolong* is a systematic thesis on the style of “Song” and “Zan”. Due to its ancient and obscure phraseology, many misreadings produced in later life urgently need to be corrected. The “Ya” in “Yaersifu” means implicitly exhorting instead of elegance; “Zhiqu” in “Bubianzhiqu” refers to the theme of “Zhaochongguosong” and “Xianzong-song”, no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and “Fengya”; “Jingshenruming” means that “Song” is as respectful and cautious as “Ming”, rather than the meaning of “Youyou” in “WenFu”, not to mention changing “Ming” into “Zhen”.

Key words: Song(颂); exhort; theme; respectful